

识才爱才悉心培养

赵藩(1851—1927年),字樾村,一字介庵,晚号石禅老人。白族,云南剑川人。云南著名学者、诗人、书法家。清朝举人,历任易门县学训导、四川酉阳知州、永宁道、盐法道,按察使等职。赵藩重视人才培养,曾出资为剑川金华书院购买大量书籍。1899年,赵藩回剑川,向父亲家乡的读书人中谁最有才气,父亲首推周钟岳。周钟岳(1876—1955年),自幼家境贫寒,但读书十分刻苦,少时就被称为“颖悟异常”“落笔惊人”的才子,考取秀才后,两次参加云南乡试未中,以教书谋生,勤苦钻研学问。周钟岳拜见赵藩,二人诗文唱和,赵藩十分欣赏他的才华,决意栽培,周钟岳奉赵藩为宗师。

1900年春,周钟岳进大理西云书院深造,赵藩以“践履笃实,志趣远大”相勉励。周钟岳非常感动,觉得这8个字让他从迷茫中醒悟过来,看清了自己的人生道路。他过去取字生甫,期望此生充满活力;后又号惺甫、惺庵,主要取“惺”字中的醒悟之意。赵藩的赠言让周钟岳“终身佩之不敢忘”。这年赵藩离开剑川时,考虑到周钟岳家境困难,决定将其带在身边,亲自教授,还请名师指点,并承担周钟岳的学习、生活等费用。1902年春,在成都读书的周钟岳突然咯血,赵藩请名医为其诊治。了解到周钟岳主要是因为读书刻苦积劳成疾,赵藩除每天为他熬药并以炖鸡、鲜肉汁进补外,还买来古琴,强令其放下书本,弹琴陶冶性情,静心休养。赵藩开导周钟岳,读书首要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素养,把自己造就成有用的人,有志向的人。得到老师的精心护理和耐心疏导后,周钟岳心情放松,身体迅速好转。周钟岳在多年后写《周惺庵三十六岁以前之回忆录》,提及此事还十分动情,说:“介庵调护至周,视如至亲。”

循循善诱走向进步

1903年,周钟岳辞别恩师,回云南参加乡试,取得全省第一的好成绩。1904年,周钟岳赴河南开封参加会试,师生二人在四川泸州相聚,赵藩鉴于近代以来中国内外形势,语重心长地叮嘱周钟岳:万一名不上榜,就到东洋留学。你要明白,老路走不通了,必须另寻新路!周钟岳未能考中进士,便由滇省学务处派赴日本留学。周钟岳于当年9月入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。1905年底学习期满后,为了不辜负恩师“另寻新路”的期盼,又到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。赵藩去信鼓励其“经世之学,不可不读”。

清政府派遣学生留学日本,目的在于培养效忠于自己的臣仆。然而,许多留学生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、政治学说熏陶,选择了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道路,周钟岳即其中之一。1906年1月,孙中山和黄兴在东京约见云南学生杨振鸿、吕志伊、李根源、罗佩金等,建议他们创办革命刊物。4月,云南同盟会在东京创办的《云南》杂志,周钟岳担任总编辑,在杂志上发表《滇越铁路赎回之时机及其办法》《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》等宣传革命的文章,并编著《法占安南始末》一书,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。又与同盟会云南支部张耀曾、席聘臣等合办《新界碑》,向国人尤其是云南人宣传新思想。

同盟会创办《云南》杂志时,“在经费方面,由杂志社致函国内同乡与缅甸华侨劝募……四川臬台赵藩、提督

> 云南选才用才育才史话

人才是创新之核、发展之要、强滇之基。在云南历史上,人才为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事例不胜枚举。晚清民国时期,赵藩慧眼识英才,精心培养扶持周钟岳,使其成长为著名的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学者、诗人和书法家,二人共同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、云南地方文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,在云南及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影响,成为历史上人才兴滇的一段佳话。



周钟岳为抗战时期出版的《云南防空实录》题词



周钟岳主持完成的《新纂云南通志》

赵藩著作《向湖村舍诗初集》



1931年8月29日,省立东陆大学董事周钟岳(1排左7)与龚自知(1排左4)、何瑶(3排左1)等师生在会泽院合影。

夏毓秀及京外同乡人士乐捐,得五六千元。”赵藩为创办革命杂志慷慨解囊,与周钟岳等人的宣传动员分不开。1907年,云南当局要求周钟岳回省办学。周钟岳特意到成都看望恩师,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中国同盟会的革命主张,赵藩很感兴趣,直到云南提学使叶尔恺亲自来电催促,二人才不舍告别。

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

赵藩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,读书为官都强调经世致用思想,由于看到了晚清的黑暗统治以及受革命思想影响,他开始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。1908年初,四川革命党准备在叙府(今四川宜宾)发动起义,因消息泄露,领导人谢奉

琦被捕,赵藩营救未果,愤而辞职,于1910年返回剑川。1911年辛亥革命大势已去,赵藩恰于赴昆明途中经大理,被公推为迤西自治总机关总理,后被云南军都督府任命为迤西巡按使兼摄腾越关道,协助李根源处理滇西军政事务。1912年被选为国会议员,次年进京,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遭迫害,秘密潜回云南,竭力协助唐继尧护国讨袁。护法运动中,赵藩于1918年被唐继尧聘为广州军政府总裁代表(唐继尧为七总裁之一),列席大元帅府会议,任交通部总长。他悉心筹划,提出西南铁路方案,力促南北议和。因对军阀割据不满,于1920年辞职回滇,从此淡出政坛。

赵藩一手栽培的周钟岳,在辛亥革命中先后出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参议及参议院参议、登庸局局长、都督府秘书长、滇中观察使,编纂《天南电报》《云南光复纪要》等辛亥革命资料,追随蔡锷进京任全国各界局秘书长;在护国运动中出任四川督军署秘书长;在护法运动中出任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、云南省省长。之后,周钟岳还担任过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长、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、总统府资政,积极支持抗战。在解放战争中,竭力营救在“九九整肃”中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。新中国成立后,周钟岳被聘为云南文史馆馆员,1954年任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文化建设成就双峰并峙

赵藩擅长诗、词、楹联及书法,生平著述甚丰,主要有《向湖村舍诗初集》《向湖村舍诗二集》《向湖村舍诗三集》共64卷,《向湖村舍诗集》20卷、《小鸥波馆诗抄》8卷、《介庵楹句正续合抄》3卷等。为四川成都武侯祠撰写楹联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,从古知兵非好战;不审势即宽严皆误,后来治蜀要深思”,以书法精妙和见解高远受到世人推崇。这副楹联在海内外享有盛誉,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楹联之一。赵藩晚年出任云南图书馆馆长,专注于云南历史文献的整理,主持编纂集云南文献大成的《云南丛书》205种1402卷。

周钟岳擅长诗文、书法,著有《惺庵诗稿》《惺庵日记》等。书法作品方面,为南京国民总统府题写的“总统府”和石林风景区题写的“石林”,为世人所熟知。周钟岳亦致力于云南的文化事业,1931年,成立云南省通志馆,周钟岳任馆长,历经18个寒暑,于1949年主持完成《新纂云南通志》纂修,全书266卷,648万余字。又编纂《续云南通志长编》等。

1927年赵藩去世后,周钟岳亲自操持丧事,手书挽联:“是全滇文献所关,何不愁遗一老;感毕世师资之德,何止心丧三年。”他悼念老师的诗一写就是50首,题名《哭石禅师五十首》。

在晚清至民国这一社会剧烈变革时期,云南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本土学者,如赵藩、陈荣昌、周钟岳、李根源等。他们早期接受传统教育,在国学方面打下坚实基础。近代教育制度改革后,不少人到国外考察、留学,接受新的学科知识,扩大视野,怀抱经世致用的思想,一些人走上从政道路,在民主、民族革命中立下卓越功勋,被称为仁人志士。到晚年多专注于整理文献、办学校、发展文博图书馆事业,为中国及云南近现代的政治、文化和教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,这批人才成长的生动故事,值得我们回望总结。

(作者单位: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、文献研究所)

赵藩与周钟岳的师生情缘



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

“文化”的关系,而该书充分展现了在民俗文化研究中葆有神话叙事本体研究的方法,是不可多得的作品。

(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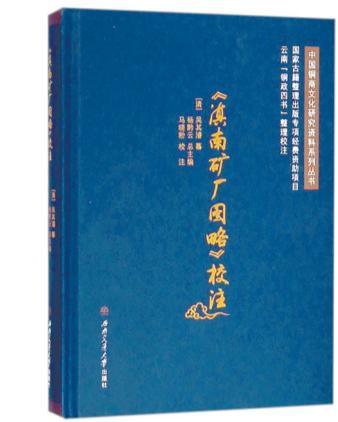
学者总督吴其濬

为政与做学问两不误,道光皇帝赞其“学优守洁,办事认真”

张佐



日本翻印出版的吴其濬撰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书影



作为中国铜商文化研究资料系列丛书出版的《滇南矿厂图略》

兴趣广泛著述丰富

吴其濬为官30年,职务多变,升迁缓慢,但他毫无怨言,尽职尽责办公务,脚踏实地做学问,可谓居官一品、学问一流。吴其濬兴趣广泛、多才多艺,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想问题、做学问,因此著述很多,计有《弹谱》《弹弓新编》《植物名实图考》《滇南矿厂图略》《念余阁诗抄》《军政辑要录》等,内容涉及植物学、医药、矿产、冶金、文学、艺术、军政等方面。

职务多变但尽职尽责

嘉庆二十四年(1819年),吴其濬选派为广东乡试正考官,选拔了许多广东的人才。道光元年(1821年),担任实录馆纂修官,因其父母相继谢世,回籍丁忧。还朝后,于道光九年(1829年)担任日讲起居注官。道光十一年(1831年),入值南书房。道光十二年(1832年)出任湖北提督学政,致力于培养湖北的人才,三年任满后回京城,仍入直南书房,不久升为洗马。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擢鸿胪寺卿,旋授通政司副使。道光十六年(1836年),超擢内阁学士,兼礼部侍郎衔,充《玉牒》馆副总裁。道光十七年(1837年),授兵部左侍郎,命提督江西学政,旋调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,仍保留江西学政职务。后升任山西巡抚兼管盐政,在任上奏裁公费一万多,严捕烟贩,洁己奉公。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调任湖南巡抚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连署浙江、云南巡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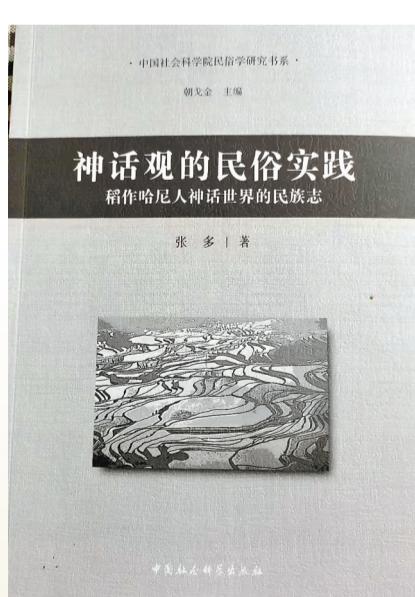
吴其濬任云南巡抚期间,大刀阔斧整顿东川矿务,使东川铜矿产业焕然一新。当时,鸦片战争战败,清朝廷与英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,战争和巨额赔款让朝廷财政十分困难,吴其濬整顿东川矿务成效显著,多少缓解了财政问题。由于在云南政绩卓著,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,吴其濬升任云贵总督。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,因旧疾屡发,吴其濬陈请开缺免除职务。回乡不久,于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病故。吴其濬为在云南官期间,勤于政务,屡上疏言事,多被采纳。道光皇帝赞其“学优守洁,办事认真”,加恩赏太子太保衔。



红河哈尼梯田 本报记者 杨峰 摄

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新收获
——评《神话观的民俗实践》

史军超



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宝库,其中不仅有传说故事,也包含各民族的历史记忆、哲学思考、生态理念、社会规范等,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。其中,少数民族的神话即为具有代表性的文类。

某种意义上,神话是一种文化的产物,是指引所有后起思想的悠久源泉。各民族的神话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,是世界观的体现,神话具有高度的解释性和前瞻性,不是人类的呓语,而

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“全息投影”,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展现。

比如说,世界各民族远古时期大多持有“地球生命共同体”的理念,并体现在各民族的神话中。这种共同体不仅只是“生命共同体”,因为远古神话里讲述的不仅有生命物质,也包括非生命物质,所以可以称其为“地球命运共同体”。中国的哈尼族也不例外,哈尼族古典思想认为,天地万物、日月星辰和人类一样,都是由一条巨大的金鱼生养出来的,在哈尼族的史诗中,鱼母神被认作创世者。不论在哪个时代,把以往的、前贤的思想进行现代化转换,根本是为了未来。哈尼族稻作文明背后的神话传统正是这种古为今用的典型,因而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立足当代、未来进行阐释。

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约有100

万亩梯田,1300年来一直养育着当地各民族人民。今天,哈尼族、彝族、苗族、瑶族、壮族、傣族、拉祜族、汉族等各族群众都共享梯田稻作系统,他们相互交往、交流、交融,创造了精密的文化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式。但一直以来,对于水稻梯田族群所持有的神话观,宇宙观的研究,与生态、社会、农耕等方面的研究相比,存在明显的滞后。

由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多著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的《神话观的民俗实践》,是在深入调查基础上体现“共同体”观念的重磅新作,是